
探討在台國際學生的高／低情境溝通模式、 不確定性容忍度與生活適應的關聯

李亮儒、鄭嫻嫻*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國際學生的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不確定性容忍度對其在台生活適應的影響。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 203 位($N=203$)國際學生為樣本，經由複迴歸分析與皮爾森相關分析驗證研究假設。研究結果顯示國際學生的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不確定性容忍度確實可以預測其在台生活適應的程度。溝通模式越偏向高情境的學生，在台灣的一般生活、工作與學習，以及人際互動的適應程度就越好。不確定性容忍度越高，在三個層面的生活適應程度也越好。而且，溝通模式越偏向高情境者，其不確定性容忍度也越高。研究結果驗證了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文化差異層面理論運用在旅居學生生活適應的適用性。

關鍵詞：高／低情境溝通模式、不確定性容忍度、生活適應、國際學生、文化差異層面理論

*李亮儒為慈濟大學傳播學系學士。

鄭嫻嫻為慈濟大學傳播學系（所）副教授，亦為本文通訊作者。聯絡方式為：
chengchuan@mail.tcu.edu.tw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根據教育部統計（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2014），2013 學年度大專校院境外學生在臺留學或研習人數總計 78,261 人，相較於 2012 學年度的 66,026 人增加了 12,235 人，成長率為 18.53%；在 2016 年有機會達成在臺境外生人數至 10 萬人之目標。依照教育部（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2015）最新的 2014 學年度在學各類學生人數統計資料，境外生（學位生及非學位生，含外國學生、僑生及陸生）人數成長已超過 9 萬人。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際學生來到台灣攻讀高等教育學程與留學研修，在陌生的國度生活，不乏面臨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的現象存在（Oberg, 1954）。因為文化、語言與價值觀不同，與同儕們相處時會感受到一些巨大壓力，這些壓力可能來自於同儕對自己母國文化的不瞭解，以及個人於當地語言文字能力尚未精通而造成與同儕交流的壓力，或是對新環境的生活方式、飲食習慣與氣候的不適應等都會造成文化衝擊的發生（黃文燊，2009；蔡昕璋，2012）。在最初面臨文化適應的過程，常常使人感到消沈與挫折，這些壓力有可能會反映在心理、生理、情感與認知上，進而影響到生活適應的困難（Lovell-Hawker, 2004）。

而學生的生活適應良好與否，會影響其學業表現（潘正德，1996）。對外國學生而言，能越早適應在台灣留學的情境，不但能節省完成學業所需要的時間，也可以在學業上有更佳的表現。因此，探討國際學生在台的生活適應問題是重要的研究議題。而影響國際學生適應旅居生活的因素很多。根據黃文燊（2009）的研究指出，這些因素包括個人與群體兩個面向。個人因素包括語言能力、飲食習慣、文化智商、國際經驗、人格特質、在台時間，以及來台動機等。而群體因素主要是包括人際互動、國家文化、文化衝擊等等。而在眾多影響旅居學生生活適應的因素中，溝通不良、溝通方式較為直來直往、還有人格特質和台灣主流價值觀有差異可能會是造成適應不良的主因（黃文燊，2009）。在人際互動中，如果無法正確和對方溝通，不了解對方的語言使用規則，可能會造成交流上的不便與困擾（李曉紅，2010）。而來自不同國家人們也會因為不同文化而產生一些隔閡，造成

適應不佳的情形發生（Yoo, Donthu, & Lenartowicz, 2011）。

截至目前為止，國內外探討學生生活適應的研究有，旅居美國的國際學生在生活適應過程獲得幸福感的來源（Tseng & Newton, 2002），中國學生旅居新加坡的生活適應問題（Steele, 2010），大一新生的的人格特質、生活適應與學業成績的關聯（潘正德, 1996），大一新生的生活適應（李燕鳴、劉文玲、陳福士, 2002），大學生的學校生活適應與情緒穩定（吳佩玲、楊錫林、江金山, 2005），宿舍環境與大學生宿舍生活適應（田麗珠, 2009），大專學生家庭功能、親子衝突、因應策略與生活適應的關聯（邱紹一、胡秀媛, 2009），國際學生生活適應和社會支持網路的關聯（王漢琨, 2012），新移民家庭子女自我概念、學業表現與生活適應的關聯（何緯山、陳志賢、連庭嘉, 2011），外國學生的生活適應與生涯發展（劉品佑, 2007），國際學生在台灣跨文化經驗研究（趙弈昕, 2013），大陸學生在台灣生活適應與學習滿意度之研究（蔡翠旭、林草蓉、陳怡珮、程伊防, 2012），以及社會支持、情緒智力與生活適應的相關等（林淑惠、黃韞臻、林佳筠, 2009）。由上述文獻得知，國內的研究鮮少探討受到文化影響的個人特質與溝通模式對旅居學生生活適應的影響。而上述兩因素是決定國際學生在旅居國能否順利完成學業的關鍵。

在受到文化影響的個人特質與溝通模式中，以不確定性容忍度（Hofstede, 2001）與高／低情境溝通模式（Hall, 1976）對旅居學生的生活適應可能較具影響力。高低情境溝通模式（high/low context）是美國學者 Hall（1976）所提出的溝通模式概念，將溝通模式分為高情境與低情境兩種。高情境溝通模式（high context）的使用者在溝通時，許多事情通常不用明說，以情境線索來解讀訊息的涵義；反之，低情境溝通模式（low context）的使用者在溝通時，則需要更加明確的表達辭意，讓語言就是本意（Kim, Pan, & Park, 1998）。不確定性容忍度（uncertainty avoidance）是荷蘭學者 Hofstede（1989）所提出的概念，用於解釋來自不同文化的個人對於不確定性事物所能容忍的程度，以及面對未知的反應。以上這些個人特質與溝通模式可以預測國際學生的生活適應，與生活適應有著密切的關連。高／低情境溝通模式是不同文化之間具有的差異，而不確定性容忍度反應了一個

人對於未來不確定性所產生的因應行為，和生活適應可能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夠找出不確定性容忍度、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生活適應之間的關聯，且了解其三者之間的運作模式。

貳、理論與研究假設

一、相關理論

（一）高／低情境文化

美國人類學家 Hall (1976) 的研究，將各國文化依照溝通方式不同而大致分為「高情境文化」與「低情境文化」兩種類。來自低情境文化的人，說話模式較為直接，想法與感覺的表達盡量直接的與清楚的呈現在語言裡 (Hall, 1976)。而且，溝通主要的內容以明白的訊息與自我傾向呈現 (Yu, King, & Yoon, 2010)。反之，來自高情境文化的人，說話模式較為含蓄，重視對話背後的意義多於口頭上的說辭，情感上表達較為間接、婉轉，期待長期的交友關係，人與人之間有深厚的情感連結與私人關係；在這種文化中，許多溝通是不言明的，留給文化作解釋 (Hall, 1976)。對於相同文化圈的成員來說，為非常迅速、高效的溝通模式，但若非同個文化圈的成員來解釋時則會相當費力。因此，來自高情境文化的人也具有區分圈外人與圈內人的特性 (黃思懿, 2014)。高情境文化的典型代表有中國、日本、韓國等。而來自低情境文化的人，說話模式較為直接，說出口的話通常直接代表他真正想要傳達的訊息；低情境文化類型的代表有德國、美國、英國等國家 (江依玲, 2011)。而這種高低情境溝通的概念為相對的，一個文化之文化情境比一個國家文化高，卻又可能同時比另一個國家文化情境來得低，會因為跨文化溝通時的交互影響而有所變動 (黃思懿, 2014)。

（二）不確定性容忍度

目前在跨國文化研究的理論當中，以荷蘭學者 Hofstede (1984) 的文化差異層面理論 (dimensions of cultural variation) 最為人所知。Hofstede (2010) 調查了 50 多個國家的文化，將不同文化價值觀的差異分為六個面向：個人主義／集體主義 (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權力距離

(power distance)、不確定性容忍度 (uncertainty avoidance)、長期取向／短期取向 (long versus short term orientation)、放任／約束 (indulgence versus restraint)，以及陽剛文化／陰柔文化 (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這六種文化差異的面向提供一個架構用以解釋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其自我概念是如何差異的。這些文化差異的面向可以區分為兩個層面，文化與個人層面。就文化層面而言，不同文化重視這些面向特質的程度不同，而呈現文化價值觀的差異；例如，美國文化傾向於個人主義，日本文化傾向於集體主義 (Hofstede, 2010)。就個人層面而言，來自個人主義文化的個人表現個人主義傾向的程度也有差異，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個人表現集體主義傾向的程度也有差異。文化間傳播的學者 (e.g., Kim, Hunter, Miyahara, Horvath, Bresnahan, & Yoon, 1996; Gudykunst, Matsumoto, Ting-Toomey, Nishida, Kim, & Heyman, 1996) 認為個人層面比文化層面的文化差異更能清楚的預測個人的行為。例如，個人層面的個人主義 (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集體主義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更利於解釋個人的行為 (Markus & Kitayama, 1991)。因為每一文化皆存在著文化層面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只是程度的差異而已 (Gudykunst et al., 1996)。換言之，我們不能斷言所有的美國人皆是典型的個人主義者，而所有的日本人皆是典型的集體主義者。這是概率的問題。當我們預見一位美國人，可以猜測他／她可能是個人主義者的機率較高。反之，當預見一位日本人，可以猜測他／她是集體主義者的可能性較高。

雖然各個文化差異的面向皆可能或多或少會影響國際學生在地主國的生活適應，但是不確定性容忍度可能是最具影響力的。因為不確定性容忍度強調的是個人對於生活事件的不確定性所展現的反應，這和國際學生面對課業的壓力、與不同國籍的同儕交流，以及異國文化的陌生環境有高度的關連性。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個人層面的不確定性容忍度對旅居台灣的外籍學生生活適應的影響。因為每一個文化裡面的個人對於不確定性的容忍程度都不同 (Yoo et al, 2011)。

根據 Hofstede (1984)，所謂不確定性容忍度為，人們面對不確定的情境所能忍受的程度；在一個不確定與模糊的情境下，不確定性容忍度的強

弱會影響社會改善這種不確定性與模糊的程度。來自不確定性容忍度較高文化的人民會比較喜歡嘗試新奇的事物、勇於冒險；反之，來自不確定性容忍度較低文化的人民則較不喜歡冒險犯難，比較不喜歡改變（謝淳雅，2007）。比起不確定容忍度較低的社會，在不確定較高的社會，家庭生活較為緊張，父母會比較害怕冒險的後果（Mertens & d'Haenens, 2014）。換言之，父母會比較傾向於不鼓勵子女從事冒險的行為。

（三）生活適應

就目前各學者研究觀點看來，「適應」這個詞彙有著不同的定義。綜合各學者的看法（王漢琨，2012；何宜純，2010；孫育智，2004），可以歸納出四個觀點。（1）適應是人與環境互動的連續過程。（2）適應是人與環境互動過程所採取的因應行為。（3）適應是人與環境互動後的結果。（4）適應是一種狀態，是個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關係與和諧程度。因為國際學生的生活適應以跨文化適應為主，必須調整自己的行為與旅居國的環境保持和諧狀態，以便因應在新環境的生活。換言之，跨文化適應是國際學生的個人特質與台灣社會文化互動的過程，因為是過程，表示研究所測得之人際、學習與社會環境的適應狀況，可能隨著國際學生的旅居時間長短與時期而變化。因此，本研究將生活適應定義為，個人為了與環境達到和諧而做出的因應行為。

有關國際學生的生活適應可分為一般生活適應，工作與學習適應，人際互動適應三個方向來探討（洪鏡月，2004）。一般生活適應（general adjustment）指的是國際學生到了台灣，對台灣的氣候、食物與居住環境等在心理上感到舒適的情形；工作與學習適應（work/ study adjustment）指的是不同的工作／學習價值、期望、標準下，心裡感到自在的程度；而人際互動適應（interaction adjustment）指的是國際學生來台灣後，在台灣感受到不同的溝通風格與人際互動調適的情形（洪鏡月，2004）。

二、研究假設

（一）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生活適應

人類學家 Edward T. Hall (1989) 認為高情境溝通的文化使用高情境語言，像是中文、日文、韓文與美洲印第安文等。在溝通的時候，訊息會藏在於個人的表達之中，很少直接完整的用語彙表達出來。而低情境文化則使用低情境語言，像是德文、英文與法文等，則正好相反，透過大量使用詳盡的文字來傳達訊息（葉咏廷，2014）。在高情境文化中，很多事情都是不說明，不說破，交給文化來闡釋的。在高情境文化中，語彙的選擇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說話者只要使用較少的字彙，就能夠表達意思給相同的母語使用者傳達其中的涵義。而在低情境文化中，必須使用非常明確的字彙來傳達含意，相較之下，單一詞彙的重要性就沒有高情境文化來的高（黃思懿，2014）。

而高情境文化與低情境文化並沒有一個統一分出孰高孰低的方法，是相對比較出來的，當一個被普遍認為是高情境的溝通模式文化使用者，到了更高的情境溝通文化生活，那麼他原先的高情境溝通模式文化就會被視為低情境文化。孟子敏（1992）的比較分析也發現，在中文裡有些話會委婉的說，在英文則是直接的談論，例如在公開場合的批評，或是對他人的感覺。個人溝通會是旅居者能否良好適應地主國文化的重要關鍵，認識當地的文化會更容易適應新環境（黃文燊，2008）。換言之，國際學生若是能了解台灣的文化，則更容易適應在台的留學生活。相較而言，台灣是高情境溝通的文化，對於來自高情境溝通文化的國際學生而言，可能較容易適應台灣的生活。

黃文燊的研究發現（2008），國際學生會受到個人、群體與組織而影響其跨文化適應。林俐君（2007）發現，在台灣學習的時間越長，結交的外國朋友越多，其跨文化的適應能力會越好。由此可以推論，若較熟悉台灣的溝通模式，則比較容易適應在台灣的生活。張庭芳（2007）發現，國際學生在剛進入異國文化的時候，會出現溝通、人際互動、語言等方面的適應困難。由此可以推論，剛進入異國文化的時候，在一般生活適應與人際互動適應都會受到影響。黃奕暉（2007）也發現國際學生會因為國籍、種族與教育性質而使生活適應出現不同的差異。因此，本研究的第一個假設為：

H1a：國際學生的情境溝通模式指數會與其在台灣的一般生活適應呈正相關。

H1b：國際學生的情境溝通模式指數會與其在台灣的工作及學習適應呈正相關。

H1c：國際學生的情境溝通模式指數會與其在台灣的人際互動適應呈正相關。

（二）不確定性容忍度與生活適應的關聯

不確定性容忍度主要是建構在社會試圖以法律、科技或是宗教來嘗試控制未知未來的程度（Hofstede, 2001）。高不確定性容忍的人，凡事順其自然，喜歡冒險與挑戰，就算是日常生活規律被打破，也不會感到不舒適（Hofstede, 2001）。而低不確定性容忍的人則相反，把不確定性看成是一種威脅，比較喜歡照著計劃執行，最好有著執行準則行動，不太喜歡改變，一旦規律被打破，較容易感到不舒適（Hofstede, 2001）。

每一個文化裡面的個人對於不確定性的容忍程度都不同（Yoo et al., 2011）。當國際學生到台灣留學的時候，有可能會遇到與同儕合作的機會，在彼此對事情的不確定性容忍度不同的情況下有可能會造成生活互動上的摩擦，導致生活適應上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將根據個人的不確定性容忍度的特質來推論，不確定性容忍度比較高的人是否比較容易適應新環境。從潘正德的研究（1996）可以發現，學生的情緒與社會適應等個人特質與生活狀況有關聯，個人特質也會與學業成績有關聯，生活狀況也會與學業成績有關聯。由此可以推論，同樣為個人特質的不確定性容忍度會與生活適應有所關連。而徐昌燕（2006）的研究也發現，個人特質與生活適應有密切關聯。而根據 Yoo 等人（2011）的研究也發現，不確定性容忍度與跨文化適應上具有關聯。因此，本研究的第二個假設為：

H2a：國際學生的不確定性容忍度指數與在台灣的一般生活適應呈正相關。

H2b：國際學生的不確定性容忍度指數與在台灣的工作與學習適應呈正相關。

H2c：國際學生的不確定性容忍度指數與在台灣的人際互動適應呈正相關。

（三）不確定性容忍度與高／低情境溝通模式

根據 Hall（1976）的研究，高情境溝通模式的人通常會嘗試著避免正面的衝突，保持社會的和諧與親密關係的連結性。同時，高不確定性容忍度的人也比較擅長容忍模糊的情況發生，許多事情保有模糊的空間也不會感到不舒適（Hofstede, 2001）。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低情境溝通模式的人說話比較直來直往，重效率，也不畏懼當面的衝突，比較實事求是。同時低不確定性容忍度的人會試圖避免模糊不定的情況，許多事情沒有模糊的空間，習慣統一規則與重視專家權威（Hofstede, 2001）。

低情境溝通模式的人和低不確定性容忍度的人一樣，皆傾向將法律、規則等建構的非常健全與詳盡。高情境溝通模式的人和高不確定性容忍度的人相似，都會將規則等保有一些彈性（Hall, 1976）。高情境溝通模式的人面對新情況時，可以在舊體制裡發揮極為出色的創造力，但是在處理全新的問題時，會顯得不知所措（Hall, 1976）。低情境溝通模式的人在處理全新事情可以非常的創新與富有創造力，但在舊的體制裡會相對顯得呆板（Hall, 1976）。而研究發現不確定性容忍度與顧客忠誠度有關聯；因為低不確定容忍度的人較不喜歡變化，因此對於品牌的忠誠度較高（Ndubisi, Malhotra, Ulas & Ndubisi, 2012）。由此可推，個人的溝通模式越傾向於高情境，其不確定性容忍度也會越高。因此，本研究的第三個假設為：

H3：國際學生的情境溝通模式指數會與其不確定性容忍度呈正相關。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測量工具

本研究使用問卷測量的方式，讓受測者以自評（self-report）的方式來蒐集研究資料。以全國大專國際學生為對象，經由網路發放問卷。隨著國際網路的興起與普及，網路為現代人必備的工具之一。因此，許多科學研究人員也開始使用網路進行資料蒐集，讓網路迅速的成為進行研究的媒介之一。與傳統的抽樣調查方式相比，網路問卷回收時間快、低成本，且因為受試者不需要和研究者面對面，因此受試者更能夠自然且放心地回答問題（Koch & Emrey, 2001）。因此，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將問卷貼放在網路上，讓自願的受試者自行填答。

因為個人特質無法透過直接觀察法得到結果，自評能夠提供研究者有關研究參與者全面且豐富多樣化的生活經驗，是一種能夠跨情境的資料蒐集方式。自評同時也可以確實蒐集人們評估自己的行為而得到深具意義的研究資料，也是一種最能夠直接測量高低情境溝通模式、不確定性容忍度與生活適應的客觀方法。相較於訪談，自評的方式受到社會讚許性（social desirability）的干擾較小。因此，本研究使用自評的方式來測量自變項與依變項。

（一）高／低情境溝通模式

高／低情境溝通模式的測量採用 Kim、Pan 與 Park（1998）所編製的「高情境／低情境溝通文化量表」。此量表共 16 題，共分成五個構面，「社會適應」、「責任感」、「衝突」、「溝通」與「面對新情境」。各分量表採用 Likert 七點計分，依序 1 為「非常不同意」，7 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的情境溝通指數越高。在本研究，總量表內部一致性的 Chronback α 值為.83。

（二）不確定容忍度

不確定性容忍度的測量採用 Yoo、Donthu 與 Lenartowicz（2011）所

編製的 CVSCALE (Individual Culture Values Scale) 量表。量表共有 26 題，有五個分量表。本研究僅採用其中的「不確定性容忍度」分量表，共有五題。此量表採用 Likert 七點計分，依序 1 為「非常不同意」，7 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的不確定性容忍度越高。在本研究，此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的 Chronback α 值為.90。

(三) 生活適應

生活適應的測量採用洪鏡月 (2004) 根據 Black 與 Stephens (1989) 的量表所編製的「跨文化適應量表」。此量表原來有 13 題，共三個構面，「一般生活適應」、「工作／學校適應」與「人際互動適應」。本研究在「工作／學校適應」增加一題，內容為“*How adjusted am I studying with Taiwan's classmate?*”。此量表採用 Likert 七點計分，依序 1 為「非常不同意」，7 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的生活適應情況越好。在本研究，總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的 Chronback α 值為.94。三個構面的 α 值，分別是「一般生活適應」為.88，「工作與學習適應」為.85，「人際互動適應」為.79。

以上三個量表的題目皆使用英文問答。在量表設計完成後，加入性別、年齡、國籍、主修科系，以及留台時間等人口變項，組成一份完整的問卷。

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目前正在台灣求學的國際學生。研究以便利與滾雪球取樣 (Snowball sampling) 尋找合適的樣本。首先，將問卷 post 在 google 的網頁上，以網路透過研究者自己所認識的國際學生，以及各大專院校的國際學生中心，詢問各國的國際學生是否願意協助填寫問卷。然後讓願意參與研究者上網填答。填卷的時間約在 5 到 10 分鐘。填卷完成之後，進一步以滾雪球的方式，請填卷者介紹他們認識的國際學生，作為受試對象。

最後有 217 位國際學生協助完成問卷填答，剔除 14 份的無效問卷，共得到 203 份有效問卷 ($N = 203$)。研究參與者的平均年齡為 20.74 ($SD = 1.75$)。性別方面，男性有 88 人 (43.3%)，女性有 115 人 (56.7%)。在居住地方面，以亞洲佔居多數 (89.2%)，中南美洲其次 (4.4%)，北美洲 (3.4%)，

也有少部分來自歐洲與非洲（共佔 3.0%）。平均在台灣生活的時間為 23.83 個月($SD = 28.20$)。多數學生沒有在台灣與母國以外其他的國家生活超過六個月（77.3%），只有少數的人有過這種經驗（22.7%）。

肆、研究結果

一、初步資料分析

問卷回收完成之後，將所得資料以 SPSS Statistics 18.0 版本進行數據資料分析。首先以因素分析與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檢視測量工具的信效度。再以敘述統計進行初步資料分析。最後以複迴歸分析來檢測高／低情境溝通模式、不確定性容忍度對生活適應的解釋力，來驗證研究假設。

（一）因素分析

高低溝通情境量表的原作者只是將五種概念的題目合併成一個構面，共 16 題，並沒有經由因素分析區分構面。而且，各個概念的題數很懸殊。（見表一）

表一：「高低情境溝通模式」量表的題目

Social Orientation:

1. It's very important to me that feel I am a part of a group.(+)
2. My social status is an very important part of my life.(+)
3. I often feel left out of things going on around me.(+)
4. Being able to work in harmony with others should at times come before doing the job well. (+)
5. In general,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my inner self than to be famous, powerful, or wealthy.(-)

Responsibility:

6.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a mistake in an organization is on the supervisor rather than on the subordinate who actually made it.(+)
7. It is not wise to sacrifices one's interests for the benefit of an organization he/she belongs to.(-)

Confrontation:

8. I conform to social norms even when they conflict with my personal desires.(+)
9. Insults to our honor are not always important enough to bother about.(-)
10. It is all right for people to raise question about even the most sacred matters.(-)

Communication/ commitment:

11. A person's word is his bond and you need not spell out the details to make him behave as he or she promised.(+)
12. A person cannot think unless he/she can put it into words.(-)

Dealing with New Situation:

13. Learning new ways to think does not excite me very much.(+)
14. I have difficulty thinking in new and unfamiliar situation.(+)
15. I try to anticipate and avoid situations where there is a likely chance I will have to think in depth about something.(+)
16. Everything is changing too fast today.(+)

(-)為反向題，(+)為正向題

換言之，如果要將 16 題細分成數個構面，需要經由因素分析過程，來確認區辨效度。雖然「高低情境溝通模式」量表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KMO 值為.78，Barlette 球型檢定顯著，萃取出負荷值在.50 以上的四個因素，可以解釋 57.74%的變異量。然而，由表二可以看出，五個構面難以區分。因此，最後決定維持原來的一個構面，共 16 題。內部一致性信度的 Chronback α 值為.83。

表二：「高低情境溝通模式」量表的因素分析

	Component			
	1	2	3	4
social orientation #4	.750	.214	.158	.213
social orientation #1	.736	.236	-.017	-.115
confrontation #10	.697	-.002	.039	.211
social orientation #2	.683	.385	-.025	-.114
social orientation #5	.611	-.009	-.032	.451
responsibility #7	.549	-.094	.295	.366
dealing with new situation #16	.528	-.064	.486	-.099
communication #12	.171	.731	.051	.108
confrontation #8	.153	.642	.284	.214
confrontation #9	.093	.629	.208	.157
social orientation #3	.195	.081	.715	-.012
dealing with new situation #15	.076	.326	.665	.126
dealing with new situation #14	-.051	.141	.634	.315
dealing with new situation #13	-.182	.481	.532	-.056
responsibility #6	.028	.266	.200	.762
communication #11	.350	.420	-.020	.589

（二）信度分析

項目分析（item-analysis）結果顯示「高／低情境溝通模式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 α 值為.83。「不確定性容忍度量表」的 α 值為.90。「生活適應量表」三個個構面的 α 值，分別是「一般生活適應」為.88，「工作與學習適應」為.85，「人際互動適應」為.79。而總量表的 α 值為.94。（見表三）

表三：各量表的 α 值

各量表	α 值	題數
高／低情境溝通模式量表	.83	16
不確定性容忍度	.90	5
整體生活適應（總量表）	.94	14
一般生活適應	.88	7
工作與學習適應	.85	3
人際互動適應	.79	3

（三）敘述統計分析

敘述統計分析顯示 203 位受試者在「高／低情境溝通模式」量表的平均分數為 4.15，標準差為.79。在「不確定性容忍度」量表的平均分數為 4.73，標準差為 1.19。在生活適應的平均分數為「一般生活適應」($M = 4.65$ ， $SD = 1.05$)最高，其次是「工作與學習適應」($M = 4.61$ ， $SD = 1.26$)，「人際互動適應」($M = 4.51$ ， $SD = 1.27$)最低。（見表四）

表四：各量表的平均值與標準差

各量表	平均值	標準差
高／低情境溝通模式量表	4.15	.79
不確定性容忍度	4.73	1.19
整體生活適應（總量表）	4.61	1.09
一般生活適應	4.65	1.05
工作與學習適應	4.61	1.26
人際互動適應	4.51	1.27

$N = 203$

敘述統計分析顯示在人口變項、自變項與依變項的相關係數中，年齡對高／低情境溝通模式($r = .32$ ， $p < .01$)、不確定性容忍度($r = .41$ ， $p < .01$)、整體適應($r = .33$ ， $p < .01$)、一般性適應($r = .30$ ， $p < .01$)、工作與學習適應($r = .28$ ， $p < .01$)以及人際互動適應($r = .37$ ， $p < .01$)呈顯著正相關。留台時

間對不確定性容忍度($r=.27, p<.01$)、整體適應($r=.34, p<.01$)、一般性適應($r=.31, p<.01$)、工作與學習適應($r=.30, p<.01$)與人際互動適應($r=.37, p<.01$)呈顯著正相關。而性別與異國經驗對不確定性容忍度、溝通模式與生活適應沒有顯著差異。(見表五)

表五：人口變項、溝通模式、不確定性容忍度與生活適應的皮爾森相關

	性別	年齡	留台時間	異國經驗
高／低情境溝通模式	-.01	.32**	.11	-.05
不確定性容忍度	.02	.41**	.27**	-.06
整體適應	-.01	.33**	.34**	-.03
一般性適應	-.02	.30**	.31**	-.04
工作與學習適應	-.03	.28**	.30**	.02
人際互動適應	.04	.37**	.37**	-.07

**為在顯著水準在 0.01 時 (雙尾)，顯著相關。

*為顯著水準在 0.05 時 (雙尾)，顯著相關。

N=203

敘述統計分析顯示在自變項與依變項的相關係數中，高／低情境溝通模式對不確定性容忍度($r=.69, p<.01$)、整體適應($r=.59, p<.01$)、一般性適應($r=.58, p<.01$)、工作與學習適應($r=.52, p<.01$)與人際互動適應($r=.56, p<.01$)呈顯著正相關。不確定性容忍度對整體適應($r=.64, p<.01$)、一般性適應($r=.65, p<.01$)、工作與學習適應($r=.56, p<.01$)與人際互動適應($r=.59, p<.01$)呈顯著正相關。整體適應對一般性適應($r=.96, p<.01$)、工作與學習適應($r=.94, p<.01$)以及人際互動適應($r=.92, p<.01$)呈顯著正相關。一般性適應對工作與學習適應($r=.83, p<.01$)與人際互動適應($r=.81, p<.01$)呈顯著正相關。工作與學習適應對人際互動適應($r=.84, p<.01$)呈顯著正相關。(見表六)

表六：溝通模式、不確定性容忍度與生活適應的皮爾森相關係數

	1.	2.	3.	4.	5.	6.
1.高／低情境溝通模式	1.00					
2.不確定性容忍度	.69**	1.00				
3.整體適應	.59**	.64**	1.00			
4. 一般性適應	.58**	.65**	.96**	1.00		
5. 工作與學習適應	.52**	.56**	.94**	.83**	1.00	
6. 人際互動適應	.56**	.59**	.92**	.81**	.84**	1.00

**為在顯著水準在 0.01 時（雙尾），顯著相關。

N=203

二、驗證研究假設

（一） 高／低情境溝通模式、不確定性容忍度與生活適應

複迴歸分析顯示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不確定性容忍度可以同時預測一般生活層面的生活適應 ($F_{(1, 201)}$ 改變 = 82.56, 調整後 $R^2 = .45, p < .01$)。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一般生活層面的生活適應呈顯著正相關 ($\beta = .25, t = 3.47, p < .01$)，表示國際學生的溝通模式越傾向於高情境，其在台灣的一般生活適應越好。因此，H1a 假設成立。不確定性容忍度與一般生活層面的生活適應呈顯著正相關 ($\beta = .47, t = 6.51, p < .01$)，表示國際學生的不確定性容忍度越高，其一般生活適應越好。因此，假設 H2a 成立。（見表七）

複迴歸分析顯示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不確定性容忍度可以同時預測工作與學習適應層面的活適應 ($F_{(1, 201)}$ 改變 = 52.17, 調整後 $R^2 = .34, p < .01$)。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工作與學習適應層面呈顯著正相關 ($\beta = .26, t = 3.24, p < .01$)。因此，假設 H1b 成立。不確定性容忍度與工作與學習適應層面呈正相關 ($\beta = .36, t = 4.74, p < .01$)。因此，假設 H2b 成立。（見表七）

複迴歸分析顯示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不確定性容忍度可以同時預測人際互動適應層面的生活適應 ($F_{(1, 201)}$ 改變 = 63.69, 調整後 $R^2 = .38, p$

<.01)。國際學生的情境溝通模式指數與其在台灣的人際互動適應呈顯著正相關。因此，假設 H1c 成立。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人際互動適應層面呈顯著正相關($\beta = .29, t = 3.83, p < .01$)。不確定性容忍度與人際互動適應層面呈顯著正相關($\beta = .39, t = 5.02, p < .01$)。因此，假設 H2c 成立。(見表七)

表七：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生活適應的複迴歸分析

模型		調整後 R ²	F 改變	df	F sig.	Beta	t	sig.
1	一般生活適應	.45	82.56	201	.00			
	高低情境溝通模式					.25	3.47	.00
	不確定性容忍度					.47	6.51	.00
2	工作與學習適應	.34	52.17	201	.00			
	高低情境溝通模式					.26	3.24	.00
	不確定性容忍度					.36	4.74	.00
3	人際互動適應	.38	63.69	201	.00			
	高低情境溝通模式					.29	3.83	.00
	不確定性容忍度					.39	5.02	.00

(二) 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不確定性容忍度

假設 H3 預測，國際學生的情境溝通模式指數會與其不確定性容忍度呈正相關。皮爾森相關分析結果顯示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不確定性容忍度呈顯著正相關 ($r = .69, p < .01$)。換言之，國際學生的溝通模式越傾向高情境，其對不確定性的容忍度越高。因此，H3 假設成立。

伍、討論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國際學生的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不確定性容忍度對其在台生活適應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國際學生的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不確定性容忍度確實可以預測其在台生活適應的程度。溝通模式越偏向高情境的學生，在台灣的一般生活、工作與學習，以及人際互動的適應程度就越好。不確定性容忍度越高，在三個層面的生活適應程度也越好。而且，溝通模式越偏向高情境者，其不確定性容忍度也越高。研究結果驗證了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文化差異層面理論運用在旅居學生生活適應的適用性。

一、高／低情境溝通模式、不確定性容忍度與生活適應

（一）溝通模式與生活適應

研究結果支持了假設 H1a、H1b 與 H1c，溝通模式越傾向高情境的國際學生，在台灣的一般生活、工作與學習，以及人際互動三個層面的適應越好。這可能是高情境溝通模式的特性使然。在使用高情境溝通模式的文化中，彼此比較能夠預測對方的想法或做法，溝通時強調心照不宣，凡是攤開來說可能會破壞彼此的關係（鄭加禎，2008）。因為台灣是屬於偏向高情境溝通的文化（江依玲，2011），因此，使用高情境溝通的國際學生在生活適應上較為容易，是可以理解的。此研究發現與先前黃文燊（2008）對國際學生的質性研究結果相符，證明了旅居者的個人溝通會是其能否良好適應地主國文化的重要關鍵。此研究也與先前林俐君（2007）研究全台五所大學約 900 名國際學生適應結果相符，證明了越能夠以地主國的語言溝通，越能夠適應求學生活。但與之前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更進一步瞭解到高／低情境溝通模式對不同層面的旅居生活適應產生影響。相較於語言溝通外，情境溝通在溝通中扮演不同，卻也重要的角色。語言是承載訊息的主要載體，但在高情境溝通模式中，說話當下的情境也是一樣的重要。與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說出來的同一句話可能會具有不同的含意。台灣是以高情境溝通為主的文化，因此若國際學生的母國為高情境溝通模式或是先前曾旅居過同為高情境溝通模式的國家，則比較容易在短時間內適應

生活。否則將會需要一段時間適應當地的生活。

（二）不確定性容忍度與生活適應

研究結果支持了假設 H2a、H2b 與 H2c，越偏向高不確定性容忍度的國際學生在台灣的一般生活、工作與學習，以及人際互動三個層面的適應會越良好。導致上述結果的原因可能是來自於不確定性容忍度的特性，以及台灣屬於偏向高不確定性容忍度的文化（Hofstede, 2010）。不確定性容忍度傾向較高的個人會比不確定性容忍度傾向較低者，在高不確定性容忍度的文化中生活得好，是可以理解的。個人特質偏向高不確定性容忍度的人，能夠接受新奇事物，對於不確定性事物較能夠忍受，也比較能夠接受變化（Hofstede, 2001）。因此可以推論擁有這種個人特質的人，比較能夠適應陌生環境。此研究發現與潘正德（1996）以大一新生為樣本的研究結果，以及徐昌燕（2006）以質性訪談多位僑生的研究結果相符，都證明了個人特質會與生活狀況有關聯。本研究更進一步證實了個人容忍不確定性的程度可以預測其一般生活、工作與學習，以及人際互動三種適應層面。在 Hofstede（1994）的研究中，不確定性容忍度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文化對於不確定事物所能夠忍受的程度，而高不確定性容忍度的文化不會試圖去降低不確定性，因此面對突發事故臨時變更行程等彈性非常大的事件通常比低不確定性容忍度的文化要來的得心應手，所感受到的壓力也會比較小。若國際學生的個人特質也和當地文化特質相似則較容易適應當地生活。

（三）溝通模式與不確定性容忍度

研究結果支持了假設 H3，國際學生的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個人的不確定性容忍度呈顯著正相關。也就是說使用高情境溝通模式的人，通常可以判斷是具有容忍高不確定性的特質。先前研究結果（Hall, 1976；Hofstede, 2001）顯示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不確定性容忍度具有相似的特質。高情境溝通模式的人和高不確定性容忍度的人相似，都會將規則等保有一些彈性。使用高情境溝通的人，面對模糊的情境也比較能夠忍受，否則就無法從說話的人所利用的詞彙中得知正確的涵義。高情境溝通會藉由情境來解釋所說的話的涵義，每一句話必須依照當時的情境來判斷，因此對話會具

有高不確定性。符合本研究證實兩者間具有顯著正相關的研究結果。

從研究結果可以發現，雖然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不確定性容忍度皆可以預測旅居學生的生活適應程度，但不確定性容忍度的預測力明顯高於高／低情境溝通模式。相較於高／低情境溝通模式影響的層面可能只局限在溝通的範圍內，不確定性容忍度影響的層面更為廣泛，這可能是不確定性容忍度對生活適應的預測力比高／低情境溝通模式對生活適應的預測力要高的原因。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執行過程受到自評問卷與網路滾雪球抽樣的限制，因此可能無可避免的影響了本研究的內在效度與外在效度。以下將分成四點敘述這些可能的限制。

第一、本研究採用網路滾雪球抽樣，部分受試者是以研究者的朋友為種子樣本招募的自願者。這可能導致樣本同質性過高的情況。因此這可能限制了研究結果推論到母群的能力，因而影響了研究結果的外在效度。

第二、自評可能使受試者無法正確的評斷，自評容易使受試者將事情合理化，以及受到社會讚許性的影響，回答題目時可能會做些許的調整。例如問卷第一部分的第一題題目為“*It's very important to me that feel I am a part of a group.*”。如果來自集體主義國家的受試者不想被他人認為是一個不合群的人，則有可能調整自己的答案，符合社會對於個人的期待。雖然本研究取樣過程是以各國的國際學生為招募標的，但是最後自願參與的受試者多數是來自亞洲國家的學生。這些國家多屬於集體主義的高情境溝通的文化（Hofstede, 2010）。

第三、雖然英語為國際共通的語言，所以本研究問卷的題目使用英文敘述，這可能會造成母語為非英語的受試者誤解問卷的題意，而影響答題的準確性。這種現象尤其更可能會發生本研究的受試者，多數是來自亞洲國家的學生。

第四、問卷填答過程可能出現與實際作為的差距。受試者在填答高低情境溝通模式、不確定性容忍度與生活適應量表時，題目以同意程度來計量，但受試者心中想法可能是以發生頻率程度來計量，因此可能會導致受試者填答時與實際發生狀況有差距的情況。

雖然有以上這些限制，本研究的測量工具具有很高的信效度，而且所有的研究數據印證了理論與過去的研究結果。

三、未來研究建議

經由上述研究發現與研究限制的討論，接下來將針對測量工具與樣本提出下列幾點建議供未來的研究參考。

首先，建議在測量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不確定性容忍度時，可以同時使用自評和他評兩種方式進行，可能比單獨只使用自評或者他評更加客觀。例如本研究議題研究了高／低情境溝通模式，其中的問卷題目可能會受到社會讚許性的影響，因此由重要他人進行問卷填答做比對，或許可以蒐集更多資訊以更深入的分析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生活適應的關聯性。

第二、本研究在人口變項的分布上有不均的情況，本研究多數的樣本數皆來自於亞洲，導致結果可能只能了解亞洲的國際學生來台適應情形。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以朝向其他區域的國際學生調查，使溝通模式與個人特質上的研究能夠更加完整。

第三、本研究只針對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文化差異層面理論中的不確定性容忍度進行探討。未來研究或許可以找出其他的差異層面，例如集體主義／個人主義、長期取向／短期取向以及陽剛文化／陰柔文化，是否影響旅居學生的生活適應。

四、研究貢獻

本研究的結果可以提供國際學生、學校及學術界在實務與學術的應用。綜合來說，這些研究結果有下列幾點貢獻。

第一、本研究最大的貢獻是驗證了個人特質、溝通模式與生活適應三者之間的關聯性。目前，這是第一個研究檢視三者的關聯。雖然過去的研究證實，高／低情境溝通模式會影響生活適應（Kim et al., 1998）；不確定性容忍度也和生活適應有關連（Yoo et al., 2011）。但是卻無法得知三者之間的關聯。而本研究結果可以更清楚的回答先前研究沒有回答的問題，例如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不確定性容忍度之間呈顯著正相關，以及兩者皆會同時影響國際學生在台生活適應的程度。而不確定性容忍度影響生活適應的程度比高低情境溝通模式程度要來得大。

第二、本研究結果可以補足國內對於國際學生生活適應研究的缺口與不足。有許多因素會影響生活適應，卻少有研究探討溝通模式與人格特質對生活適應造成的影響。探討高／低情境溝通模式與不確定性容忍度對生活適應的關聯，讓我們進一步了解國際學生的生活適應情形。這些研究結果超越一般生活適應的研究貢獻，提醒探討跨文化溝通與生活適應的學者，溝通模式與個人特質對生活適應的影響是值得重視的研究議題。

第三、在實務的運用上，本研究的結果可以提供個人、學校、與教育政策做為參考。個人方面，本研究結果可以了解溝通模式與不確定性容忍度對生活適應的影響。而了解個人溝通模式與對不確定性容忍度的差異與生活適應關連，可以使國際學生有心理準備，當有心理準備後到異國求學的話，心理所面對的衝擊會較小。學校方面，當相關人員做諮詢介入時，可以從學生的溝通模式與容忍不確定的程度等個人層面的文化特質開始檢視，觀察他們的溝通模式與個人特質來對他們的生活適應狀況做具體的建議，以改善生活中的適應程度。教育政策方面，可以從了解國際學生的溝通模式與容忍不確定的程度等個人層面的文化特質來提供其求學過程在跨文化生活適應的各式支持方案。

在國際學生日益增加的台灣，旅居學生的生活適應問題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值得各領域學者重視。最後，期待研究結果能拋磚引玉，讓跨文化溝通與生活適應的學者專家們，更重視溝通模式與個人特質的研究。

參考文獻

- 王漢琍 (2012)。《大學大一國際學生之生活適應與社會支持網路現況之研究：以花蓮縣 2 所大學為例》。慈濟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田麗珠 (2009)。〈宿舍環境對大學生宿舍生活適應之研究：以某學院為例〉，《建國科大學報》，28 (2)：1-18。
- 何緯山、陳志賢、連廷嘉 (2011)。〈新移民家庭子女自我概念、學業表現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大仁學報》，38：49-67。
- 李燕鳴、劉文玲、陳福士 (2002)。〈東華大學一年級新生的生活適應〉，《慈濟醫學》，14：365-372。
- 李曉紅 (2010)。〈試論如何在高語境與低語境間進行成功的口語交際〉，《四川理工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25 (1)：134-136。
- 江依玲 (2011)。《企業轉換文化差異對於留任員工心理層面之影響：以某零售公司為例》。元智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吳佩玲、楊錫林、江金山 (2005)。〈建國科技大學學生的學校生活適應與情緒穩定〉，《建國科大學報》，24 (3)：57-66。
- 邱紹一、胡秀媛 (2009)。〈大專學生家庭功能、親子衝突、因應策略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學報》，2 (2)：77-102。
- 徐昌燕 (2006)。《大學僑生成功適應歷程之質性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
- 洪鏡月 (2004)。《外派人員跨文化適應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俐君 (2007)。《調查國際學生跨文化效能之研究：以台灣就讀高等教育學生為例》。淡江大學國際商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林淑惠、黃韞臻、林佳筠 (2009)。〈中部地區五專學生社會支持、情緒智力及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學校衛生》，55：41-66。
- 葉咏廷 (2014)。《跨文化溝通為導向之華語教學課程設計：以《封神榜》哪吒故事為例》。文藻外語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庭芳 (2007)。《國際學生之適應歷程與跨文化訓練：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人力教育與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趙奕昕（2013）。《國際學生在台灣之跨文化經驗探究》。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孫育智（2004）。《青少年的依附品質、情緒智力與適應之關係》。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潘正德（1996）。〈大一新生人格特質、生活適應與學業成績的關係暨相關因素之研究〉，《中原學報（人文與社會科學系列）》，24（2）：35-51。
- 劉品佑（2007）。《外國學生的生活適應與生涯發展：以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的攻讀學位外國學生為例》。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文桑（2009）。《讀在異鄉為異客：外國學生跨文化適應之質性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 黃奕暉（2007）。《在台國際學生社會自我效能與跨文化適應經驗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論文。
- 黃思懿（2014）。《基於跨文化溝通之移民華語教材建構：以台灣北部之家庭文化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博士論文。
- 蔡昕璋（2012）。〈交換學生生活及學習適應探討之研究：以十位校薦赴日女性交換學生為例〉，《北商學報》，20：175-204。
- 蔡翠旭、林草蓉、陳怡珮、程伊防（2012）。〈大陸學生在台灣生活適應與學習滿意度之研究〉，《華人前瞻研究》，8（2）：15-42。
- 孫育智（2004）。《青少年的依附品質、情緒智力與適應之關係》。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品佑（2007）。《外國學生的生活適應與生涯發展：以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的攻讀學位外國學生為例》。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加禎（2008）。〈異文化溝通中的推論差異問題〉，《東吳外語學報》，27：155-173。
- 孟子敏（1992）。〈交際文化與對外漢語教學〉，《語言教學與研究》，1：95-110。
- 謝純雅（2007）。《文化構面與消費價值對行動商務的採用影響：以台灣年輕族群為例》。國立暨南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De Meulenaer, S., De Pelsmacker, P., & Dens, N. (2015). Have no fear: How individuals differing in uncertainty avoidance, anxiety, and chance belief process health risk message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44(2), 114-125.
- Furnham, A., & Bochner, S. (1987). *Culture shock: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to unfamiliar environments*. London: Methuen.
- Gudykunst, W. B., Matsumoto, Y., Ting-Toomey, S., Nishida, T., Kim, K., & Heyman, S. (1996).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elf-construals, and individual values on communication styles across culture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2, 510-543.
- Hall, E. T. (1976). *Beyond culture*. New York: Anchor Books.
- Hofstede, G. (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Kim, M.S., Hunter, J. E., Miyahara, A., Horvath, A., Bresnahan, M., & Yoon, H. J. (1996). Individual versus cultural level dimension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ffect on preferred conversational style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63, 29-47.
- Kim, D., Pan, Y. & Park, H.S. (1998). High- Versus low-context culture: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Korean and American cultures. *Psychology & Marketing*, 15(6), 507-521.
-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self: Implication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 224-253.
- Mertens, S. & d'Haenens, L. (2014). Parental mediation of internet use and cultural values across Europe: Investigating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the Hofstedeian paradigm. *Communications*, 39(4), 389-414.
-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self: Implication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 224-253.
- Ndubisi, N., Malhotra, N., Ulas, D. & Ndubisi, G. (2012). Examining uncertainty avoidance,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customer loyalty in two cultur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nsumer Marketing*, 24, 320-337.

- Reisinger, Y.& Turner, L.(1999).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Lisrel: Application in tourism. *Tourism Management*, 20, 71-88.
- Steele, K. D. (2010). Perceptions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Singapore: Adjustment issues and support.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71(4-A), 1165-1165.
- Tseng, W., & Newton, F. B. (2002). International studnets' strategies for well-being. *College Student Journal*,36(4), 591-599.
- Yoo, B. , Donthu, N., & Lenartowicz, T. (2011). Measuring Hofstede's five dimensions of cultural value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CVSC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nsumer Marketing*, 23, 193- 210.
- Yu, J., King, K. W., & Yoon, H.J. (2010). How much are health websites influenced by culture, content analysis of online diet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Korea. *Journal of Promotion Management*, 16, 331-359.

The Effect of High/low Context Communication and Uncertainty Avoidance on Living Adjus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aiwan

Liang Ju Li & Chuan Chuan Che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high/low context communication and uncertainty avoidance on living adjus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aiwan.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Purposive and snowballing samplings were chosen to recruit respondents nation-wide in Taiwan. The valid data for this study were provided by 203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cluding 88 males and 115 females.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testify the hypotheses of this stud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igh/low context communication and uncertainty avoidance could predict their living adjustment in Taiwan. The higher context of students' communication was, the better their living adjustment in Taiwan. The higher degree of students' uncertainty avoidance was, the better their living adjustment in Taiwan. The higher context of students' communication was, the higher degree of students' uncertainty avoidance. The results had testified the validity of high/low context communication and the dimensions of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iving adjustment.

Keywords: high/low context communication, uncertainty avoidance, living adjustment, dimensions of cultural variation